

統一戰線中的暗湧

——抗戰初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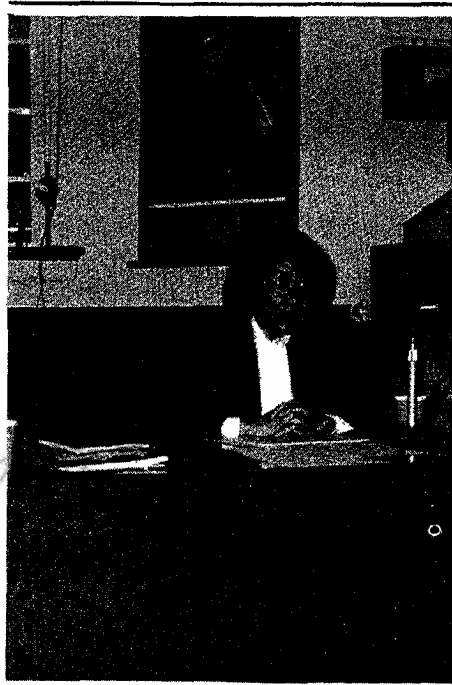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文藝界的分歧

● 盧瑋鑾

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「香港文學研討會」上的發言

引言

香港，這個地當華南地區與外國溝通要衝的小島，由於交通方便，政治環境特殊，已經不只一次成爲國際政治敏感地帶。近五十年來，這個以中國人爲主的地方，更是左右翼鬥爭、宣傳必爭的據點。所謂政治環境特殊，是由於它是英國殖民地，法例典章一向以英國爲藍本，西方重視言論自由、出版自由，香港政府也依樣遵行。戰前，雖然實施新聞出版檢查法例，但比起國內，仍算十分自由。什麼派系都可在香港辦報或出版書刊，只要先向政府註冊，由具社會地位的名人担承責任，及繳交兩三千元按金，即可成事。英國對於中國內部的政治紛爭，一向採取相當曖昧態度，以自利爲前提，只作監視而不加干涉。因此，抗戰初期，左翼、右翼、汪派、軍閥如桂系、民主人士，均紛紛在港辦報。而左右派更是兩大陣營，在這彈丸之地展開外表若無其事，內則驚心動魄的鬥爭。現試就幾件具體事例，把這段時期的文藝界分歧，概括地反映出來。



「港澳總支部」和「南方局香港分局」

早在一九三〇年九月「中國共產黨中央六屆三中全會」中，黨中央就決定要在香港建立華南交通總站，南方局在香港銅鑼灣設立了秘密機關及招待所，在九龍上海街設置秘密電台①。

到了抗日戰爭開始，在國共合作抗日的呼召下，「抗日統一戰線」形成。左右翼表面雖然同心協力抗敵救亡，但實質，仍嚴守自己的陣線，無時或斷地進行鬥爭。在香港，他們也各自設立據點，各派要員來主持大局。

國民黨主理港澳事務的是吳鐵城，他派陳策擔任「國民黨港澳總支部」的主任委員②。在中環亞細亞行二樓，設立了「榮記行」，表面是貿易公司，實際就是支部辦公室，更是宣傳中樞。「榮記行」內設「編審室」，利用津貼款項，招攬留港的文化人，「派他們做委員，寫些海外社論，又出版一些定期刊物，每人拿薪水一百元。」③在這編審室中的委員包括：嚴既澄、張孤山、祝秀俠、龍大均、陸丹林、祝百英等④，他們常在《國民日報》發表政見，立場顯明。

共產黨則由廖承志擔任華南局香港分局的負責人，同樣也開辦了一家貿易公司，名叫「粵華公司」，「買賣由東江游擊隊的同志來做。」⑤而另外在中環滙豐銀行四樓，設立了「陶記公司」，負責八路軍的一切捐款事宜⑥。兩派各以貿易為掩蔽，以不同形式，展開鬥爭。

其實，這種掩蔽，也只做給一般不知內情的人看，左右翼的人彼此知道，例如香港淪陷前夕，薩空到了亞細亞行去，就說：「大家都知道的榮記行就設在這個樓內的二樓，現在陳策也在那裏辦公，他們似乎在進行組織便衣隊，助港當局擾亂敵人的後方，樓裏來來往往的人非常混雜。」⑦而香港政府，更是一清二楚。何以見得？現不妨舉一例子說明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偷襲了珍珠港，戰火立刻已波及到香港來了。左右翼負責人也趕忙召開緊急會議，商討應變、疏散問題。但此時，香港政府也分頭與左右派負責人商討對策。據資料顯示，十二月十日，「港督代表麥都高（Macdougall）、英軍代表博差（Boxer）、警司代表米耶（Mayer）、華民司代表那夫（North）同到亞細亞行

晤商討論作戰及治安事宜。」這是陳策的記錄⑧。大約是十二月十二或十三日，一位澳大利亞籍的英國記者貝特蘭向廖承志同志提出，說香港當局想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負責人會晤，討論協同保衛港九的問題。這樣，下一天，廖承志、喬冠華和我，和香港總督楊慕琦的代表輔政司（忘其名）以及居間人貝特蘭在香港大酒店三樓舉行了會談。」⑨這是夏衍的回憶。從這兩件事看，就可見香港政府對兩派活動監視得很嚴，在緊急關頭，還會利用兩派的矛盾，為自利計來討價還價⑩。

自抗戰以來，香港文藝界的暗湧，一波復一波，全都由這兩個機構策動出來。可惜，能找到的資料不多，無法作更深入及更全面的反映。

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」和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

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，對文藝界的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。在民族存亡的關頭，果然有許多文藝工作者肯消除成見、捐棄前嫌，團結起來一致抗日。正因這樣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武漢成立的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」，雖然是在共產黨指示下組成，但仍包括了各不同流派的文藝工作者。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廣州失守，華南地區頓失一重要文化據點，而文化人又雲集香港，這正是建立宣傳陣地的大好機會，所以「文協」總會便議決推定樓適夷、許地山、歐陽予倩、戴望舒、蕭乾籌備建立「文協香港分會」⑪。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該分會正式成立，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簡又文也寫了文章，提議文人共同努力，「在意志上有共同的大目的『民族至上，國家至上』超過我們私人的意見之異同和感情之愛惡之大原因」下，抗戰救國⑫。真好一派大團結的景象。但由於在第一屆理事選舉中，「喬冠華發表了煽動性的演講後，人心一面倒」⑬，投票結果，簡又文只得了個候補幹事名位，會裏右派代表完全佔不到地位。因此，不到半年，他就受吳鐵城之命，另組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了⑭。

簡又文另組文藝團體的理由很牽強，他說：「當前文化界的大問題和大需要乃是聯合團結和合作共進，……但是聯合共進的團體仍付闕如，……我以為這個團體第一步的進行步驟應得有一個適當的會所……成爲文化界活動和交際中心。」⑮國民黨港澳

總支部文化設計委員陸丹林也附和說：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」一「顧名思義，他的成分只限於文藝工作者。爲着適應時代和環境的需要，聯合文化界各部門工作人員們共同大規模的組織，發揮光大祖國固有的文化，而和現代文化相溝通，不是更有深切的意義，切合時勢所需要的嗎？」^⑮事實上，「文協香港分會」的會員已包括了文化界各個部門的成員，而日後所設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會址，也不見得是個「文化活動中心」，因爲資料顯示，該會絕大部分活動，都不在會所舉行。

簡陸二人倡議後，《國民日報》就立刻響應，而左翼的《立報》，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一日開始，便陸續出現了反對的意見^⑰，說他們是「文化紳士，脫離羣衆」^⑱，說他們是「名士」「大師」^⑲。雖然都是些諷刺文字，但壁壘分明，陣勢已成。

這個「聯合團結」的文化組合，除了第一屆理事名單裏，包括了「文協香港分會」的許地山、楊剛、戴望舒，以後各屆理事，均是右翼文化人。（許地山較特殊，在第二屆理事會裏，仍佔一席位。）主要成員有：簡又文、胡春冰、溫源寧、李應林、羅明佑、陳訓恣、鄧志清、伍伯就、陸丹林等。

以後兩會各自活動，表面沒有明顯紛爭，不過，從此「文協香港分會」不再借用與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有密切關係的「大風社」社址，而《國民日報》也以篇幅不足爲理由，停刊《文協》周刊。最令他們傷腦筋的是：香港許多報紙總是分不清這兩個會的名稱，有時一律稱爲「香港文協」或「文協」。

一九四〇年三月，汪精衛在南京組成偽政府，發表所謂《和平建國宣言》，左右兩派爲了表示團結統一，加強抗日統一戰線精神，就來了一次大聯合。四月十四日，「文協香港分會」召開了全體會員大會，簡又文以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代表身份出席，在會中表示：「與該會爲姊妹組織，希望今後能携手合作」^⑳。四月二十七日，兩會理事舉行了聯誼會，會中宣佈：今後在報刊上簡稱：一爲「文藝協會」，一爲「文化協會」，以糾正一向的混淆^㉑。並議決兩會聯合舉辦「音樂欣賞會」，聯手實行「文化清潔運動」及「文化肅奸運動」^㉒。這段日子，可以說是左右翼文化界最合作協調時期，但其實這正是暴風雨前夕，因爲不久就發生了一場大論爭，接踵而來的就是「皖南事變」，彼此的分歧便無法隱藏了。

在「抗日統一戰線」口號下出現的這兩個文藝界組織，最能夠反映「貌不合神亦離」的暗湧鬥爭。能夠掌握及分析這兩個會的活動資料，香港文藝界在抗戰初期的分歧情況，就差不多盡在其中了。

「反新式風花雪月」論爭

香港左翼文藝界一切活動，都依黨中央推行的文藝路線進行，例如「大眾化問題」、「民族形式問題」的討論，他們都積極參予，在《大公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立報》、《華商報》上，發表重要文章，但這些討論，都沒有把右派拉進去。直到一九四〇年十月，楊剛提出了《反新式風花雪月——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》^㉓，就很快演變成一場相當激烈的文藝論爭了。

抗戰初期，「文協香港分會」屬下的「文藝通訊部」（後簡稱「文通」）對組織香港文藝青年活動，一向是很有成績的，宣傳工作也做得很好，參加的青年文藝愛好者「越來越多，其中有工人、有文員、有經紀、有護士、還有教員」^㉔。這個組織自一九三九年八月六日正式成立後^㉕，就在楊剛、黃繩、黃文愈、喬冠華、馮亦代的指導下，蓬勃發展^㉖。但什麼派系都想來爭奪「文藝青年」的領導權，據說：「那時，從廣州撤退到港九的一個國民黨徒，他以『左』傾的面貌出現，陰謀以討論文藝問題爲掩護，奪取青年的領導權」^㉗。而汪派報紙《南華日報》的文藝副刊上，也出現了《關於寫生競賽的批判——給《大公報》文藝版編者的公開信》^㉘，矛頭直指「文通」舉辦的「文藝競賽」，說「香港文協裏的仁兄們，連文藝的本質也沒有弄得清楚」，更連帶把楊剛也罵了一頓，最後更露骨地說：「今天就是『抗戰』運動已經失却了現實基礎，……更由革命的和平建國運動負起了偉大底時代任務……」^㉙。《南華日報》副刊中，多刊「通常有眼淚，通常有向故鄉凝望，有流亡的心」「仿造抒情」文字^㉚，於是楊剛針對這種文藝病態，寫成了引起一場論爭的導火線文章，她把香港文藝青年的脫離現實式抒情，歸納成殖民地人物式和公子態兩種病態。但沒想到，她這篇文章引來的反應，最強烈的不是《南華日報》，而是右翼的《國民日報》，於是，一場左右派文藝大論爭從此展開了。參加這場論爭的作家很多。首先向楊剛

文章反攻的是：胡春冰、潔夫、曾潔孺，他們在《國民日報》的《新島》版，一連兩天刊出反對的文章^{③①}，以後，《大公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、《立報》均見論爭文字，作者包括：黃繩、許地山、林煥平、喬木（喬冠華）、陳畸，及一羣「文通」作者。到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「文協香港分會」召開「反新式風花雪月座談會」，雙方主要戰將就在這會上正面交鋒了。出席人數多達二百餘人，楊剛、喬木、黃繩、葉靈鳳、胡春冰、曾潔孺等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。事後《國民日報》並沒有提及這次座談會，而屬「文通」機關刊物的《文藝青年》却刊登了座談會記錄^{③②}，及他們對這次論爭的結論^{③③}，可以推想，這次是左翼一面倒的勝利。

爲什麼右翼文藝界對「反新式風花雪月」那麼敏感？爲什麼掀起那麼強烈的爭辯？相信，這除了爭取香港文藝青年的領導權外，最重要的還是「抗戰文藝」論爭的延續。因此，會上曾潔孺就一再提到「創作方法」和「創作傾向」「題材」等問題，而楊剛、喬木、黃繩的理論却一致的是：「加強生活實踐……現實主義的寫法是最好的出路」^{③④}。這場論爭的結果，除了「新民主主義的現實主義」正式在香港提出外^{③⑤}，更使由左翼指導下的青年文藝運動，在理論及實踐兩方面，有進一步的發展。而「反新式風花雪月」論爭，也標誌了左右翼文藝界暗湧的高潮，過了這段時期，衝突就顯得尖銳而明顯了。

《星島日報》和《國民日報》

香港的「出版自由」「言論自由」，吸引了各黨派的文化人。左翼文化界早就認定這是個很理想的宣傳據點，相當有計劃進據這小島。文化人到了香港，辦報、設出版社的不少，他們更多在不同立場的報紙上，負責編務或寫稿，例如杜埃，除了從事地下文化聯絡工作外，主要就在《大眾日報》寫社論，戴望舒、郁風、金仲華、邵宗漢、羊棗就進了《星島日報》，楊剛進了《大公報》，茅盾、薩空了了《立報》。他們各佔有利的文化陣地，爲抗日、爲政治宣傳而努力。

由於在「抗日統一戰線」口號下，一般文藝界筆下，重點均在宣傳抗日，極少明顯觸及國共的紛爭。但金仲華當主筆的《星

島日報》，却常刊他報不易見到的國共紛爭消息，和立場鮮明的社論，頗爲矚目。「皖南事變」後，金仲華執筆的社論：《中山先生十六週年忌辰》^{③⑥}，就引出了《國民日報》的總主筆王新命的一連串猛烈攻擊，說《星島日報》「反國府反國民黨」，《星島日報》也強烈還擊說《國民日報》「造謠生事，含血噴人」^{③⑦}。結果雙方大戰三個多月，《星島日報》方面可能受了壓力，把金仲華、羊棗等人辭退，改聘了程滄波任主筆。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，金仲華、郁風、羊棗、邵宗漢四人聯合刊出《告別讀者》，聲明：「由於國內政治逆流的影响，我們的工作，受到了種種限制，使我們不能不向本報當局提出辭職」。雖然，表面這場鬥爭是結束了，但左右翼間的分歧，就在再無掩蓋的情況下，完全呈露出來了。

後記

近六十年來，中國的左右翼鬥爭，幾乎沒有一刻休止過，研究現代文學史的人，也無可避免面對「左右翼文藝鬥爭」這課題。近年，現代文學史研究，已有不少人注視抗戰初期的淪陷區、國統區、上海「孤島」區的左右翼文藝活動情況。但對於這個極其複雜、暗湧不斷的小島，從三十年代直至現在，文藝鬥爭活動從沒間斷的一個場所，却還沒有人全面的加以探討及描繪，畢竟是急待填補的缺口。這篇文章只憑有限的資料寫成，希望得到指正及補充。並感謝給我提供資料的各位文藝界前輩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二日，初稿。

註釋：

① 饒衛華：《我所知道的華南交通總站紅色交通線情況》，《廣州文史資料》二十四輯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，頁二十八—四十一。

② 簡又文：《策叔突圍詳記》，《掌故月刊》四期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，頁二十一—二十七。

- ③林熙（高貞白）：《連士升在香港的一段日子》，《彼文月刊》四期，一九七四年十一月，頁十一—十三。
- ④高貞白先生一九八一年三月四日口述資料。
- ⑤張友漁：《我和〈華商報〉》，《新聞研究資料》十二輯，一九八二年六月，頁十八—二十六。
- ⑥徐遲先生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口述資料。
- ⑦薩空了：《香港淪陷日記》，香港進修出版服務社，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。
- ⑧陳策：《協助香港抗戰及率英軍突圍經過總報告》，《掌故月刊》四期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，頁十四—二十一。這是陳策呈報中央原文，從未公開發表。
- ⑨夏衍：《白頭記者話當年——記香港〈華商報〉》，《新聞研究資料》十二輯，一九八二年六月，頁一—十七。
- ⑩據夏衍回憶，雙方會談後，沒有下文，那是因為：「英國人有他們自己的想法。他們知道，港九這塊彈丸之地保不住的，讓日本佔了，英美聯軍打敗日本之後，日本還得把香港交還給英國。而一旦中共部隊進入港九，那麼戰爭結束之後，問題就複雜了。」所以，結果還是國民黨在討價還價中，領得「突圍」這份差事。
- ⑪《組織概況》，《抗戰文藝》第四卷一期，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，頁四—五。
- ⑫簡又文：《文人相重論》，《大風》三十五期，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，頁一〇五—一〇七。
- ⑬徐遲先生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口述資料。
- ⑭高貞白先生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口述資料。
- ⑮簡又文在出席一九四〇年度「文協香港分會」全體會員大會時，也承認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是「秉承中央意旨」成立的。
- ⑯簡又文：《向香港文化界建議》，《大風》四十四期，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，頁一三九三。
- ⑰陸丹林：《香港文化界大聯合》，《大風》四十九期，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，頁一五四五。
- ⑱王三：《山中語》，《立報》，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一日，頁三。
- ⑲狂男兒：《文化俱樂部——香江雜詠之四六》，《立報》，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，頁三。
- ⑳大頓：《□□□□》，（該文標題被刪去，代以□號）《立報》，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，頁二。
- ㉑夏雨：《戰線的轉移》，《立報》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頁二。
- ㉒《廿九年度本會全體會員大會紀錄》，《立報》，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，頁二，《文協》四十九期。
- ㉓《兩文協理事昨舉行聯誼會》，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八日，二張六版。
- ㉔同㉒。
- ㉕楊剛：《反新式風花雪月——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》，《文藝青年》二期，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，頁三一—五。
- ㉖鄭官哲：《談「文通」——三十年代的香港文藝通訊員》，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，頁十八。
- ㉗《文藝通訊部》，《國民日報》，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，頁六。
- ㉘據楊奇先生回憶，該組織很早就成立了黨小組，一九四〇年五月後，由香港文委直接領導的文化特別支隊負責組織及領導工作。可見這是政治性很強的一個青年文藝組織。
- ㉙馮亦代：《戴望舒在香港》，《海洋文藝》第七卷五期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，頁三十四—四十。據馮先生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口述資料，這個國民黨徒是胡春冰。
- ㉚娜馬：《關於寫生競賽的批判——給大公報文藝版編者的公開信》，《南華日報》，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日，《一週文藝》二十五期。
- ㉛同㉚。
- ㉜同㉛。
- ㉝胡春冰：《關於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》，潔夫：《哪些是新式風花雪月——反新式風花雪月讀後感》，《國民日報》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，頁八。
- ㉞潔孺：《錯誤的挑戰——對新風花雪月問題的辯正》，《國民日報》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，頁八。
- ㉟松針：《反新式風花雪月座談會會記》，《文藝青年》六期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，頁七—九。
- ㊱陳傑：《論加強生活實踐——對一個爭辯的結論的檢討》，《文藝青年》七期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頁三一—五。
- ㊲同㊱。
- ㊳林煥平：《一年來的理論活動》，《立報》，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，頁二。
- ㊴《社論：中山先生十六週年忌辰》，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，頁一。
- ㊵有關此次筆戰，各文章均逐日刊於兩報中，不再一一開列刊出日期及題目。